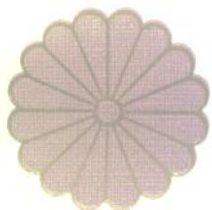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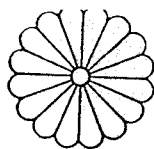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日本丛书 • 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 • 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丛书

81464



200128138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二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李民 贾纯 华夏 译

伊文成 孙文康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二卷

東京青木書店，1959年

日本丛书

近代日本思想史

第二卷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著

李民 贾纯 华夏 译
伊文成 孙文康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306-2/B·186

1991年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2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141千

印数1 800册

印张6

定价: 3.40 元

D717.64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前 言

《近代日本思想史》是从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封建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思想通史。原书共四卷,正文占三卷,第四册是年表,作为全书附录(此册未译)。

第一卷从封建末期到明治专制政权的形成,为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思想的创立时期。第二卷从明治二十年代到大正十年代,是日本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与新兴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时期。第三卷从大正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日本无产阶级思想发展并和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高潮时期。

本书的主编远山茂树(1914—)是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学者;山崎正一(1912—)是法政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比较哲学学者;大井正(1912—)是明治大学教授、社会思想史学者。第二卷执笔人生松敬三、大村晴雄、大原慧、盐田庄兵卫、西田胜、古田光、宫川透则是研究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后起之秀。日本近代思想史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课题。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和观点,可供国内研究日本思想史和日本近代史的人研究、参考。同时对于了解当代日本思想史界学者的思想、观点,乃至治学方法,本书也可能不无帮助。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第二卷由李民(说明、第八、九章)、贾纯(第五章第一、二、五节)、华夏(第五章第三、四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伊文成(第七章第I部分)和孙文康(第七章第II部分)等合译,李民校订。书内脚注除注明译者或编者注外,均为原注,一并在此交代,不另一一注明。

1987年6月

第二卷目次

第二卷说明	1
第五章 明治二十年代的各种新思潮	3
一 鹿鸣馆的欧化主义风潮	5
二 德富苏峰与《国民之友》	10
三 三宅雪岭与《日本人》	17
四 北村透谷与《文学界》	24
五 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	32
第六章 明治年代的基督教	39
一 明治年代基督教的系统——公会主义和教派主义	39
二 明治年代基督教的系统——独立派和公会主义	44
三 植村正久和内村鉴三	50
第七章 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	60
I 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理论	60
一 近代工人运动的形成及其性质	60
二 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及其水平	62
三 社会民主党的组成	64
四 所谓“社会主义”的流行时代	66
五 反战运动的展开与社会主义	69
六 战后工人运动的高涨与日本社会党的成立	73
七 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抬头与社会党的分裂	76
八 社会主义派别的形成与所谓“大逆事件”	79
II 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	83
一 前言	83
二 前史	87

(1) 政治小说的社会倾向	88
(2) 近代文学形成时期对下层社会的关心	89
(3) 日中甲午战争后文学的倾向性	92
(4) 明治三十年代前期人民的动向	94
三 社会主义文学的创立	99
四 社会主义文学的展开与退潮	106
第八章 日本唯心论哲学的形成	111
一 近代的自我在哲学上的自觉	111
二 西田哲学的形成及其展开	130
三 田边哲学的动向及其地位	146
第九章 大正民主主义及其思想	162
一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与民众	162
二 “民本主义”的本质与局限	167
三 教养主义、文化主义、人道主义	173

第二卷说明

由于编辑工作不得力，定稿推迟了若干时间，这里谨将《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呈献给读者。本书第一卷探讨了从幕府末期到明治二十年代的时期。继第一卷之后，我们在第二卷中所探讨的部分，从年代上说，包括从明治二十年代起大致到大正十年代为止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依靠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通过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的过程，大力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奠定了它的经济基础。在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日本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变，一直走的是一条上升的道路。在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逐渐呈现出全面危机的征兆，但在这个阶段，日本仍然能够讴歌“中立国的经济利益和参战国的政治利益”。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近代文化沿着这条路线蕴蓄自己的蓓蕾，不久便开放出一枝花朵的时期。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形成“绝对主义”的近代日本的可能性在一切领域中都已齐备的阶段。尔后，从大正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可以说是表明这个时期大体已经齐备的可能性进入了现实化的阶段。——关于那一阶段，我们将在第三卷中加以探讨。针对时代的这样的发展，我们首先通过概括地考察明治二十年代的各种思潮，然后探索日中甲午战争以后趋于明显化的各种思潮的动向，接着以叙述专题历史的方式，安排了下列三个项目，即明治年代的基督教；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文学；明治年代绝对主义的哲学唯心论三个部分。从它们各自形成起来大约到1910年代为止，通过

分别探讨其形成过程，借以弄清其性质，然后对伴随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而百花争艳的、所谓“大正文化”的各种思潮，加以考察。这样一来，针对近代日本文化的多种多样的发展，我们按照专题历史的方式，要对多方面加以叙述，因此，年代上就不得不在若干地方互有先后，内容也难免出现若干重复。这种情况，在试图编写思想史中的全面通史这一课题的性质上是在所难免的。读者在阅读这些多方面的叙述之后，如果能够掌握从明治开始，经过大正，继而延续到昭和的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基本动向，我们将引以为幸。

本卷的执笔人如下：第五章“明治二十年代的各种新思潮”——生松敬三。第六章“明治年代的基督教”——大村晴雄。第七章“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Ⅰ“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理论”——由大原慧执笔，盐田庄兵卫增补。Ⅱ“明治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西田胜。第八章“日本唯心论哲学的形成”——古田光。第九章“大正民主主义及其思想”——宫川透。

最后，希望各位专家对我们的尝试给予批评和指教。

宫川透
1956年8月

第五章 明治二十年代的 各种新思潮

在第一卷中已经看到，明治十年代后半期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和崩溃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政权逐步确立的过程。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以及1890年教育敕语的颁发，不言而喻表明上述发展方向的归结。制定近代宪法，开设近代议会这个问题恰恰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一贯要求，它的激烈斗争也正是为此而进行的。但是，现在公布的帝国宪法，名虽叫宪法，却是钦定宪法，“即陛下将钦定宪法赐给日本人民这种性质”（金子坚太郎《帝国宪法制定的由来》）的、根据君权至上思想的宪法，尤其是根据皇室中心观点讲解教育和道德理念的教育敕语作为这个宪法的支柱而颁发下来，所以，所谓日本的“国体”，即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的体制，至此似乎完全具备了。

在明治二十年代初期颁布宪法和颁发教育敕语这两件大事，足以使人们充分预想到明治二十年代的全面形势。一般称明治二十年代为反动时期，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以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力，竟以某种形式逐渐被吸收到这个披上近代立宪主义外衣的绝对主义国家政权机构中去。由国家政权带头，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步伐，使近代日本做好了登上国际竞争舞台的准备，在日中甲午战争以后一直踏上了扩张的道路。这条道路经过明治、大正、昭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为止，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命运的道路。可以说，在明治二十年代，它已迈出了第一步。

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与这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全面形势相适应，明治二十年代也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新情况。与幕末（欧美）黑船驶来日本直到明治十年代末激烈的民权斗争时期政治上、社会上急剧动荡的时代不同，这个时期，由于宪法的颁布，总算勉强产生了安定的气氛，对过去的政治情况开始出现反省的苗头。并且，经过对以往的政治一边倒的反省，谋求进一步建设多方面的新文化的趋势开始活跃起来。这对直到明治十年代末、为了获得自由和民权而激烈斗争的时代来说，确实是一种反动、一种倒退，但同时也是当然应进行的正当反省，又是为了形成近代市民文化而作的艰苦努力。例如，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和形成，就开始于这个二十年代。坪内逍遙曾说，1887年（明治二十年）前后“明治文学如百川冲破堤防，顿时泛滥起来；如阳春百花一时绽苞齐放出来。”这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但这并不只限于文学一种，举凡美术、思想、学术乃至其他广泛的整个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这个时代的有力的舆论领导者德富苏峰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创办了《国民之友》，到了1888年，与苏峰对立的三宅雪岭和志贺重昂等人创刊了《日本人》。并且，在此前后涌现的评论、思想、学术各种杂志之中，也开始出现了纯文学杂志。音乐学校和美术学校，分别兴建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和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这些动向，都蕴藏着下述意图，即以对明治十年代以前那个时代的反省为基础，想要形成新的文化。

但是，这个时期，在出现这种清新形势的反面，《国民之友》、《日本人》以及其他各种杂志和报纸多次遭到禁止发行，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又发生了所谓内村鉴三不敬事件，继而发生了“教育和宗教的冲突”问题，再加上东京帝国大学久米邦武教授因《神道是祭天的古俗》（明治二十四年《史学会杂志》，二十五年《史海》转载）一文而招致笔祸等等，扭转、堵塞、阻止新文化建设道路的黑手，乃

至决定这个新文化本身性质的黑影也重新蠢动起来。可是，这个时期新文化建设的趋势，毕竟由于这个疑似近代的绝对主义国家机构的完备，才可能形成的。这正是使各种明朗的或暗淡的复杂现象纠缠在二十年代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化中的终极原因。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在互相交织的各种或明或暗的现象中，来对从二十年代开始的“近代的”思想、文化的形成，以及各种新思潮的涌现情况进行考察。在这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表面上或暗中为此做了准备的、鹿鸣馆的欧化主义风潮。

一 鹿鸣馆的欧化主义风潮

明治十年代后半期，明治政府一方面对各地高涨、激烈发展的自由民权的各种运动和起义严加镇压，另一方面把修改条约作为当前的目标，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本来，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一直是沿着欧化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可是现在成了问题的竟然是喊出“脱亚入欧”口号的所谓鹿鸣馆的欧化主义。“把我~~国~~化为欧式的帝国吧！把我国人民化为欧式人民吧！在东方的前门创造出欧式帝国吧！唯其如此，我帝国才能在条约上与西洋各国跻于同等地位。我帝国只有如此才能独立，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富强。”（《世外井上公传》）这是当时带头鼓吹欧化主义的外相井上馨的话。为了接待外国人，1883年（明治十六年）11月，总共花了十八万元工程费，建成了鹿鸣馆。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4月，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主办了那次著名的化装跳舞会。在这十年期间，对欧美一切的文化、风俗的模仿和吸取都受到奖励，试图用欧化来改良社会生活的运动和风潮，漫无止境地风靡一世。

“那种一心一意只顾羡慕洋风以求交际的跳舞会，于此时举行；出自

奢华风流之余的妇人慈善会于此时兴办。此外还有脱和^①入洋的罗马字会；舍风趣而取外观的演剧改良会；以古雅为迂腐而走向露骨感情的说书歌舞的矫风会；他如书法改良、言文一致、小说改良、音乐改良、唱歌改良、美术改良、衣食住改良之类，则贵贱上下翕然唯洋风是拟，西人是仿；其甚者竟至提倡改良人种论，欲以高加索人种改换大和民族。于是终于在宫廷之内也令改穿洋式衣服，其礼法仪式也令模拟欧洲。此乃国家之所基，社会之所仰。其所作所为，不无缘故。而宴会之盛行，古今无过于此时，彼处是总理大臣的宴会，此处是外务大臣的夜宴，早晨悠扬的歌声起于东京府知事之官邸，晚上铿锵的乐声响于陆军大臣之邸内。其中明治二十年四月二十日伊藤伯爵主办的化装跳舞会，与二十七日井上伯爵在鸟居坂邸供天皇观览的演剧等，是其最著者。有人或评论说：未到罗马盛时，而先学其弊。这确是明治十七、八年至二十年之间的情况。”（指原安三编《明治正史》，载于《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编》）。

鹿鸣馆时代跳舞会这种带着华丽伴奏的欧化主义风潮，以及从衣食住直到音乐、美术、文学的改良运动，完全是由上流的为政者阶层洋气十足的趣味激发起来的，而且，虽说是欧化主义，但对欧美民主主义的根本理念——自由民权的要求，当时政府的政策却是彻底的镇压。从这里也能明显地看出，这个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只是模仿近代欧美文化的外表，把它机械地照搬过来，而各种改良运动也大都只是打算避免同旧有的传统进行真正的交锋，轻而易举地实现欧化而已。

例如，试看上面那个被批评为“舍风趣而取外观”的演剧改良会，便可了解这种情况。这个演剧改良会，是由1886年（明治十九年）8月归国的末松谦澄首倡，由井上馨、外山正一参加发起，由伊藤博文、大仓喜八郎、西园寺公望等出名赞助而设立的。该会的宗旨是：“从中等社会以上的人看来，今日的日本戏剧，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只好这样观看。特别是深居宫廷的人根本就不能到戏院里来看戏，这甚至违背与民同乐之意，只有人民自己观赏，可以

^① 和指日本。——译者

说是我们人民只顾自己,有失体统。就这一点来说,改良也是必要的。”(末松谦澄《演剧改良意见》明治十九年)另外,他所主张的具体方案是,使剧场的构造和舞台的造法同外国的一样,废止花道^①、转动舞台、幕后解说、场面房、效果伴奏等,从戏剧要素中排除音乐和舞蹈,而以科白为本位,废除男扮旦角,全部用女演员,等等,总之想要丢掉传统歌舞伎的外部要素,代之以机械地吸收欧美戏剧的外部要素。而且,当时这种粗糙的“急进的”改良运动,对于重要的脚本内容等,几乎连什么意见也拿不出来。仅在二、三年后,这个看来非常急进的演剧改良会,便被更加温和的演艺矫风会所取代了。

当时,从衣食住的改良运动直到其他一般文化方面的改良运动,都贯穿着与此相同的倾向。的确是到处弥漫着“洋风是拟,西人是仿”这种对欧美文物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和肤浅的、机械的,然而又是“自上而下”的照搬风潮。

话虽如此,但应该看到,这种鹿鸣馆式的欧化主义风潮却也相应地对新的近代文化在日本的萌发起到了若干作用。大正初期,内田鲁庵(1868—1929,明治元年—昭和四年)以《四十年前》为题写了以下的文章:

“当时的欧化如同木下藤吉郎三天内筑起清州城一样,只是外观上显得非常文明灿烂,而内容则破绽百出,化装舞会并不只是鹿鸣馆一个晚上,整个欧化时代一直都是化装舞会。结果与其说是丑态百出,莫如说是以滑稽百出的喜剧而告终。不过,正象冲走粪泥污垢的洪水在大泛滥时必然把将来变成养料的泥沙残留下来一样,这个愚蠢透顶的滑稽的欧化的大洪水,也留下了萌发新文化的养料。至少,今天的文艺美术的兴起,是从当时尊重欧洲文化的气氛中起步的。”(内田鲁庵《想起来的人们》大正五年)。

^① 花道:日本旧剧舞台两旁伸向观众席、供演员上下场的一条通道,是舞台的一部分。——译者

指出这一点很有道理。正如他讲的那样，在外相井上馨的鸟居坂邸，由团十郎剧团所演供天皇观赏的戏剧，确实“打破了向来卑视戏剧的陋见，产生了比用千言万语的论文还提高了艺术的地位达几倍的效果”。另外，以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明治十六年一十七年）、柴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明治十八年）、末广铁肠的《雪中梅》（明治十九年）等为代表的很多政治小说，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宣传手段，由自由党系统和改进党系统的政治家和政论家大量写出，为改变世人对小说的评价作出了贡献。这也可以说间接地有赖于当时“注入欧美尊重文艺的空气”的欧化主义风潮吧。

同时，在文学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文学士坪内逍遙（别号春廼舍脱，1859—1935，安政六年—昭和十年）的《小说神髓》（明治十八年）以及《当世书生气质》（明治十八年）的问世。这就是所谓“小说改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当时被评为“小说改良家的首领”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打破了在小说中加进劝善惩恶思想的泅泽马琴之流的封建作风，还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政治小说表现出来的、把文学看成政治手段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主张文学作为一种“美术”（艺术）有其独自的价值和权威，说“小说的体是人情，世态风俗次之”，提出了以追求人性为主旨的近代写实小说的理念。这件事被称为日本近代小说的晓钟。只是他的论旨，正如同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并不是十分彻底的”（《回忆漫谈》大正十四年）。正如以“春之舍脱先生戏著”为名而发表的《^二读当世书生气质^三》所表现的那样，由于还没有完全摆脱了戏作作风，结果就唤起了二十年代硯友社的似是而非的写实文学。不过，它的先驱意义，应得到高度的评价，以此为转机，产生了我国正规的近代小说的最初作品、二叶亭四迷（1864—1908年，元治元年—明治四十一年）的《浮云》（明治二十年）。进一步从当时情况来看，具有“文学士”头衔的坪内

逍遥写出小说这件事本身，打破了旧有的士君子不能摆弄小说的那种社会成见，起到了提高小说社会地位的作用，为那些从前认为除了搞政治似乎就不能飞黄腾达的天下青年，教给了还有一个新世界的存在。这也必须算在坪内逍遥一大功绩之内。

这样，在直到二十年代初为止的鹿鸣馆的欧化主义风潮和改良运动中，有过可以获得更高评价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其中还包括许多先觉者想把机械的表面的模仿转变为真正从内部形成近代文化所做的努力。例如二叶亭四迷创造言文一致文体的苦心；改良主义者坪内逍遥对演剧改良会的批评（“戏剧情节的改进”才是“改进的根本所在，不由此重新做起，其他的改进终归是不行的”，明治十九年《闻演剧改良会创立后有感》）等等，就是。再有，如内田鲁庵指出的那样，机械的表面的模仿“这个愚蠢透顶的滑稽、欧化的大洪水，也留下了萌发新文化的养料。”这种情况，不只限于文艺领域，在一般事情上，恐怕也必须这样看。不过，对“这个愚蠢透顶的滑稽、欧化的大洪水”接着产生了激烈的批判和巨大的反动，这作为时势的动向并不奇怪。而且正如已经说到的，在欧化主义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修改条约这个全体国民的大问题。到了1887年（明治二十年），在政府内部也燃起了反对井上外相修改条约方案的火焰，还有一方面是旧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另一方面是国粹的国权主义者展开了活跃的反动活动，批评和攻击政府的欧化主义政策和软弱外交，同时言论自由的要求也高涨起来。可是，当年12月25日，恶名昭彰的保安条例突然公布出来了。

在明治二十年代的思想界和言论界起过指导作用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杂志《国民之友》和《日本人》，尽管各自倡导的宗旨不同，但它们的创刊对上述时势动向都怀有积极对抗的意图，这一点是共同的。

二 德富苏峰与《国民之友》

德富苏峰，(本名猪一郎，1863—1957，文久2年—昭和32年)创刊《国民之友》，是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2月15日。这个杂志在第一号发行后，就被称为“第二个明六杂志”，引起人们争相阅读，立即成为杂志界的霸王。据《苏峰自传》(1935，昭和10年)载，当时的杂志的发行份数，一般大致在一千份以下，普通约为五百或六百份左右，如果达到一千份以上，就算是最畅销的了。可是《国民之友》创刊号，尽管一狠心多印了一些，却转眼间就卖光了，于是发行再版、三版，最后总数竟达数万份。德富苏峰写道：“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接着，第二期以后的销售情况也未下降，全卖出去。所以，当时《国民之友》如何受到人们的好评，从其销售盛况程度便可想而知。

德富苏峰在《国民之友》创刊第一号中，写了堪称发刊辞的《啊，国民之友诞生了！》。他说：“啊，国民之友诞生了！为什么诞生了呢？因为到今天日本的形势有其必要了。所谓必要是什么呢？恕我试说一说。”文章从这一段文字开始，一面回顾开国以来的历史，一面指出：破坏旧日本，建设新日本的维新改革的大经纶和大目的，就1887年(明治二十年)的现状来说，无论在政治、社会或文化哪一方面都没有完成。同时阐述了在从“破坏的时代”转向“建设的时代”的形势下所诞生的《国民之友》的抱负。然后，德富苏峰对当时鹿鸣馆的欧化主义作了如下的批判。

“泰西社会是平民社会，其文明也出自平民的需要，本无需我来解释。然而，当这种文明一引进我国，不幸囿于贵族的眼界，无端带上贵族的臭味。于是泰西文明的恩泽，仅限于一个阶级蒙受，对于其他大多数人，不能不说是无关痛痒，无任何关系，几乎处于漫不经心的状态。衣服